

張鳴 著

# 重說

# 中國近代史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 目 錄

第一講 中國近代政治史開場白	9
對於近代史的“三婦”心態	11
中西兩種體系	12
中國的抵抗	15
第二講 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一)	21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開端	22
中國和英國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25
鴉片——打破中英貿易結構的不平衡	34
第三講 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二)	43
英國對中國政策的成本核算	44
中英的戰爭技術和戰略對比	46
開放教禁帶來了西方的輸入	49
傳統歷史締造的兩個神話	51
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	53
第二次鴉片戰爭	55
第四講 帝國古老命題新解(一)	63
關於太平天國起義原因的商榷	64
清末統治的主要問題	67
洪秀全創教史	71
太平軍起義	76
太平軍的問題	80

第五講 帝國古老命題新解(二)	87
戰爭的天平開始傾斜	88
關於太平軍的幾個問題	91
湘淮兩軍——漢族士大夫的崛起	93
“同光中興”	97
第六講 從自強到變法(一)	105
洋務運動的起因	106
洋務運動的開展	110
北洋水師	119
洋務運動未必是場失敗運動	121
第七講 從自強到變法(二)	125
洋務運動存在的問題	126
甲午戰爭	131
戊戌變法	133
第八講 從自強到變法(三)	143
戊戌維新的貢獻	144
清政府對於變法的態度	147
列強對於變法的態度	155
民眾對於變法的態度	157

第九講 義和團運動(一)	161
民教衝突的產生	162
天主教與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衝突	165
清朝官府對於民教衝突的態度	170
清政府對於義和團的態度	175
第十講 義和團運動(二)	179
義和團興起的原因	180
義和團的特點	183
東南互保	188
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190
第十一講 清廷的新政	197
新政的成就	199
預備立憲	203
廢除科舉	208
滿族親貴收權	214
第十二講 辛亥革命	221
革命的發生	222
會黨的特點	223
革命黨結緣幫會的原因	227

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231
袁世凱這個人	234
第十三講 袁世凱的悲劇	241
共和體制的問題	242
袁世凱與國民黨的對峙	246
袁世凱的悲劇	254
第十四講 黯然北洋	261
段祺瑞與黎元洪	262
府院之爭	264
張勳復辟	270
南北交戰	273
第十五講 眾說紛紜的“五四”	283
白話文運動	284
五月四日政治運動	287
五四運動的弔詭之處	293
五四運動的影響	294
後記	299
附錄：中國近代歷史大事年表	300

第一講

中國近代政治史開場白

我們為甚麼要學歷史？我的一個朋友曾提過一個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來突然失憶了，忘記自己是誰了，想想看你今後該怎麼生活——你誰都不認識，這意味著忘掉了自己的歷史。歷史看起來好像沒甚麼用，但實際上我們是離不開它的。其實對於一個民族，無論是其整體還是個人，記憶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就是民族的記憶。很多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處於失憶狀態，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歷史長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課，中國內地大學本科都在開，但是名義上講的是歷史，實際上卻不是當成歷史課開的，而是按政治課開的，即使在歷史系也是如此。這種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世界觀，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觀念史。所謂史實，是被要求服從某種觀念的。如果我們今天從一個常人的是非和真偽角度來看，這樣的歷史就是偽史。上這種政治課的時候，大家都興趣不大，經常睡覺或者看小說。但別看上課的時候不以為然，其實你還是或多或少會受它影響，一到在網上談某些事情的時候，只要涉及歷史，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套東西搬出來了。也就是說，我們會鄙視一個假的東西，但是我們依然依賴這個假的東西。這就令人很困惑。

中國的近代史，有一個范文瀾、胡繩的基本模式。<sup>①</sup> 這種模式通常有兩條線索，其中一條是帝國主義侵略論——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總是侵略、欺負中國。強調這樣一條脈絡，由此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是

苦難深重的，同時說明我們的落後是因為別人侵略、欺負我們造成的。另一條線索就是革命線索——三大革命高潮，從太平天國、義和團然後到辛亥革命，總之就是一個反抗、革命的過程。這樣一段悲慘的近代史，一段總是折騰的歷史，很容易使我們忽略從晚清以來這麼多豐富的變化，不知道該怎麼走後面的路，不知道為甚麼要改革、要開放，為甚麼還要學洋人那一套東西。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知道近代中國是怎樣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無視這個過程，而只強調我們一直在革命，那麼我們就不會明白為甚麼要放下革命搞建設，不會明白為甚麼要重新開放。結果也就只能是我們重來，再重來，重新開始鼓噪革命，重新開始鼓噪排外。可是這樣一來，我們會回到哪兒去呢？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面臨著這樣的困惑。<sup>②</sup>

## 對於近代史的“三婦”心態

以往我們對於中國近代史有三種慣常的態度。在此，請允許我打個不嚴謹的比方。第一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總是在哭，總是在鬧。不僅哭鬧，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

圓明園那幾個水龍頭能賣出天價來，就是因為這種心態在作怪。那幾個水龍頭怎麼可能是英法聯軍搶走的呢？當時圓明園珍寶如山，英法聯軍會搶這幾個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來的水龍頭嗎？它們十有八九是在這個園子廢了以後，被中國人弄到外邊賣掉的。賣出去也就是當個擺設，當時仨瓜不值倆棗，現在卻賣給華人，賣到幾千萬，可見國人這種怨婦心態已經根深蒂固。

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甚麼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但是我們覺得很好，還很推崇，因而創造出很多神話。如果當時鬥爭真有這麼波瀾壯闊，那麼英國人根本進不來，我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這段被稱為半殖民地的歷史。

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但是被殖民的過程實際上是很屈辱的，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尤其對這個民族的上層精英來說。如果這些上層精英曾受過本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熏陶，他們就會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婦心態把這一層抹掉了——就覺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文明，卻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奪和奴役。這種心態，其實有點變態。<sup>③</sup>

“三婦”心態實際是國人對待近代歷史比較常見的心態。有人說，這好像都不大對頭啊，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歷史和外來者呢？我說，我們能不能別在歷史和外國人面前當婦人。你可以將其當做朋友，也可以視為敵人，只要自己別像婦人一樣就成。關於心態問題，我覺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時候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

## 中西兩種體系

所謂近代史，如果按中國傳統史學來說，就是晚清史。中國傳統史學，是朝代史，像唐史、宋史、明史、清史這樣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劃分來說，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國近代史。我們怎麼看待近代史，或者說怎麼看待我們的晚清史，這個歷史過程到底意味著甚麼，這是我們首先要

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晚清歷史的本質就是西方把中國拖入他們的世界體系的過程。西方有個世界體系，我們有一個天下體系，或者叫朝貢體系。但是我們這個天下體系（朝貢體系）是內斂的、內縮的。就是說，並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塊殖民地，然後建立起一個朝貢體系讓其他人來服從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種文化的、以德服人的方式讓周邊國家來仰慕我的文化，然後向我進貢；或者以大國之威，讓周邊國家向我朝貢。有的朝代也會打一下，佔了地方，不是當殖民地，而是直接佔領。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來。天下體系就像一個圓，這個圓的中心是中國，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來不來我不管：你來朝貢，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來呢，隨你的便。顯然，這樣一個體系不是向外輸出的體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後呢，實際便形成了一個輸出型的體系。它不斷地把這個體系向外輸出，把它所遇到的地方，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納入自己的體系中來。在這兩種體系的碰撞中，我們的天下體系顯然崩潰了。<sup>④</sup>

我們幹不過人家，就得聽人家的。中國人開始是被動接受，人家兵臨城下，我們捏著鼻子忍受；後來有點主動性了，逐漸產生了解人家的慾望，開始學習《萬國公法》。我們在 1862 年開始設置同文館的時候，主要學習的就是《萬國公法》。我們開始想了解這個世界體系是怎麼回事——所謂的《萬國公法》，其實就是西方那個世界體系的規則。

開放口岸也是如此：開始是人家逼著我們開放，這次開放一些，下次再開放一些，後來我們就自己主動開放了。學習亦是如此：開始是被動學習，然後是半推半就、中體西用，最後是全面地學習——到了辛亥革命的時候就是全面地學習。不光是西學東漸，而且是西俗東漸。如果注意看一下那個時候的報紙，就會發現當時所有西洋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車是文明車，

連火柴都是文明火。話劇是文明戲，我們的京劇叫舊戲。凡是西洋的東西都意味著文明，都意味著是需要我們學習的。這說明甚麼呢？說明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心悅誠服地被拖入了這個體系——我們認賬了。為何會這樣？因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類創造和追求財富的需求，一旦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普及開來，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驅動力驅使人們去進入他們的世界。這就是一個近代史的過程。

可能在我們今天看來，西方的世界體系不見得是甚麼好事情。它是在工業革命過程中建立的，跟工業革命息息相關。如果按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的說法，其實西方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偶然，但是這個偶然卻造出了大事。為甚麼呢？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一個新工商文明，而現代工商文明這樣一個潘多拉之匣被打開後，世界就變了。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著走。

我覺得這個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對資源掠奪和榨取得太厲害，對環境破壞得太快。就像《莊子》裡那個故事，說是一個老頭在澆園子，園裡有一口淺井，老頭每天拿個瓦罐跳到井裡，打一罐水然後爬上來澆。子貢問他為甚麼不弄個桔槔（就是槓桿），那樣多方便。老人說他知道那個東西，但是他不用。為甚麼不用那玩意兒呢？它是機械，人用了機械就起機心了，就想著怎麼取巧，從此天下就不得安寧了。<sup>⑤</sup> 其實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這個大工業文明喚出來之後，人們就天天想著怎麼取巧——人們去發明創造，翻著花樣地想著怎樣去榨取資源——人類幾萬年的歷史都沒有弄出這麼些事來，但這幾百年就都實現了，而且後面會怎麼樣，人類還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進入這個軌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開後，就回不去了。你想進去也罷，不想進也罷，都回不去了。你看這世界哪個地方還沒有進入這個體系？哪個地方還沒有受到工業文明的污染？哪個地方還是桃花源？沒有辦法，你只能在這個文明的基礎之上，想一點補救的辦法。比如出現了土壤板結、農藥污染問題，人們只

能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想辦法發明一種污染較小的農藥，以及使土地板結程度較低的化肥。人們只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類都不可能逃脫這個被工業化的命運，抗拒它是沒有用的。西方的發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給我們帶來這個東西，世界的命運已定，已然逃不過去了。

## 中國的抵抗

所謂中國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義和團，他們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邊兒的東西全部幹掉。從街上抓來一個長得像學生的人，搜搜包，如果發現裡面有一張洋紙，那麼那個人的腦袋就沒了。有一支鉛筆也不行，鋼筆更不行。當時他們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這樣做換來的是一個很悲慘的結果，我們被迫簽訂了《辛丑條約》。根據條約規定，外國可以在中國北京駐軍，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中國軍隊不能駐軍，外國軍隊卻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後來中國人要在這一帶駐軍，只能把軍隊服裝換成警服，以警察部隊的名義進駐。<sup>⑥</sup> 不僅如此，中國還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

這種抵抗是無效的，任何地方的這種抵抗都是無效的，因為這是大勢所趨。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開，這個世界和人類的命運就已經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業文明沒有出來之前，我們可能有很多種選擇。比如，我們可能還在慢慢地走，出門還騎驢。進京趕考的人給老婆寫封信，估計她三個月以後才能收到。過去的風俗，長久以來都這樣，或許現在某些地方還是這樣。因為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大體進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話，我們的進步有限，尤其是技術進步有限。有人可能說，秦朝燒不出瓷器來，清朝可以燒出許多花樣的瓷器來。但秦朝的陶罐子

也能頂用，一樣可以煮飯、打水。還有馬車，秦始皇那個時代的馬車，跟現在我們看到的馬車沒甚麼本質區別，只是現在的馬車是膠皮輪子而已，進步非常有限。

那個時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點，只能待在家裡，不能出去上學，婚姻大事都由別人做主，看上誰也不能直接嫁給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覺還好，如果有本事就出來，考個秀才、中個舉人很爽的。很多人覺得我們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失去了一些東西。現在人們普遍活得比較緊張，文明越往後發展，人們越緊張，也就沒有閒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錢的讀書人閑下來，就會想現在的生活太沒意思、太乏味了，過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園詩一樣的生活。吟吟詩，喝喝酒，談談風月，一天到晚沒甚麼緊張事，一覺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們會懷念這樣的生活。

實際上我們作為人，很難有一種狀態是感覺非常好的。當回頭看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既然我們不可能逃脫這個命運，那麼我們的感慨、我們的憤慨或者我們的不滿意都只能是一種牢騷而已。那麼我們幹嗎要這麼折騰呢？這樣想來，心情就會好一點，就會平和。我們可以設想，有沒有可能擺脫這條道路？其實歷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路。這個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國人一直都想走一條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們最早學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學西方就行了，幹嗎學日本呢？日本納入西方是後來的事情，當時還不算西方呢。我們之所以學日本，是因為覺得日本好，日本學西方是學了一條捷徑，我們如果直接學捷徑就更捷徑了。甚麼叫捷徑呢？就是抄小路。人家這麼走，我們抄小路趕上去，走到前面去。後來我們又學俄國了，也是想抄近路。學俄國實際上也是學西方，看俄國人抄小路突然之間就富強了，就厲害了，就變成蘇聯可以跟美國人抗衡了。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想學美國，辛亥革

命以後成立了臨時政府，那就是美國模式。為甚麼學美國呢？因為當時我們認為美國是最先進的，我們把最先進的直接拿來用就行了。

抄近路學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捷徑的東西學過來，這本質上就是想走一條中國自己的特色道路。這條道路無論怎樣，還是離不開工業文明。也就是說，無論怎麼講中國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時代老牛破車的道路上去，都不能迴避工業文明自搞一套。

我們現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條全新的路？我覺得很不容易，因為我們很難走出這個大框架，很難走出來一條跟這完全不一樣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

還有，中國人能不能不捱打？毛澤東說了，中國人學西方，但是為甚麼先生老打學生？<sup>⑦</sup>的確，他們老打我們。但是回過頭來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如果不捱打，能去向西方學習嗎？說實在話，我們走到今天也可以說是被打出來的。不捱打就學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艦隊去了，一看日本人沒甚麼大船，就遞上條約訂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軟了，就同意開放——日本的開放不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而是從幕府時代就開放了。還沒打，日本就開放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往前學。但是中國人做不到，這可能跟國民性或民族性有關。不捱打，就很難學人家，被打得很慘，才學得好一點。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發現，日本的傳統其實維護得很好，西方看東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歷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們悠久，但是為甚麼它在西方受到的評價那麼高？就是因為它走出來了，它成功了。你現在成功了，人家才會重視你的過去。如果你現在甚麼也不是，那麼你的過去就是一堆垃圾。就算你想發揚國粹、弘揚傳統，都沒機會。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對待歷史，不能走出歷史，那麼我們過去的歷史就甚麼都不是。

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段歷史，又該怎麼去做？很顯然，我們需要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後

去看待我們的未來，儘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裡反覆折騰、反覆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

#### 註釋

- ①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即是范文瀾先生，其所著《中國近代史》（上冊）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論”：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乃第一階段，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為第二階段，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為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為第四階段。他認為第一階段包含反帝反封建兩個矛盾，以反封建矛盾為主；第二階段包括國內民族鬥爭和反帝兩個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階段以反帝為主要矛盾；第四階段以反封建為主要矛盾。而胡繩先生則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後一本書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影響深遠，一版再版。胡繩始終堅持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展規律時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他在表述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時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論斷。
- ② 余英時先生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為題的演講，指出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從頑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我們走過至少三十年；從改良破產、戊戌政變到革命救國以至辛亥革命軍起，我們花了十三年；從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們只花了短短八年。激進的革命情懷爆發的頻率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強。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錢穆與中國文化》，209 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 ③ 這個其實有點類似於病理學上講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也就是受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了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種情感使得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早年內地有人稱，香港應再被英國殖民三百年，就是類似這種情婦心態的反映。
- ④ 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將西歐的現代國家秩序與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進行了精彩比較。他認為：第一，近代西方的國家秩序乃是各自擁有主權、在形式上平等的國家所建立的，但實質上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係，強國以各種方式控制弱國，干涉其內政；而朝貢體系雖是建立在本

質是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平等關係之上，但作為宗主國的中華帝國原則上並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第二，西歐國家秩序一方面隱藏著將自己擴大為“世界秩序”的衝動，另一方面則本著基督教的救世情結，持續不斷地向西歐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擴張；中國主導的東亞朝貢體系則奉行“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東漢何休語）的所謂“不治主義”，從而表現出一種內向的自我封閉的孤獨傾向，擴張意識非常微弱。參見〔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頁、1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 ⑤ 出自《莊子·天地》，現有成語“抱甕灌畦”。
- ⑥ 這一招倒是袁世凱想出的主意。參見張鳴：《歷史的底稿：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8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
- ⑦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作了一個國人皆耳熟能詳的描述和概括，他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甚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的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隨後，毛澤東就告訴我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參見《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當然，今天看來，毛澤東以“先生欺負學生”為理由，可能為了論證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正當性。

第二講

兩個世界最初的碰撞（一）

這一講來說說鴉片戰爭前後的一段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反覆思考的。

中國人當時對西方世界，尤其是對作為對手的英國人，是不太了解的。包括像林則徐這種我們傳統上認為是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物，其實也只是在到達戰爭前線之後，才臨時抱佛腳真正開始觀察西方世界。而英國人至少在當時已經掌握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情報和信息，他們知道中國的許多事兒，不僅有軍事的，還有經濟的。當雙方發生衝突時，中國人並不知道該怎麼應對，而英國人則有明確的目標，即以最小的成本解決商業糾紛，進而打開中國市場，跟中國人進行貿易。

##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開端

上一講說過，現在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時間劃分其實是借用了世界的概念，若是按中國傳統對歷史階段的劃分，一般會變成朝代史。

美國傳教士丁韋良曾經當過京師同文館以及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外國人的外國人，他一直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近代的這段歷史。<sup>①</sup>他把中國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清末新政之前的歷史分為六段，其時間節點的選擇與如今通行的說法有所不同：第一段是鴉片戰爭，以及洪秀全初創拜上帝教；第二段是亞羅戰爭，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三段是中法戰爭；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戰爭；第五段是義和團運動；第六段是日俄戰爭和中國的新政改革。

丁韞良是以感知中國人對外國人的開放尺度來劃定這幾個階段的，隨著歷史往前走，中國人對外國的開放尺度不斷加大。我們現在看也會覺得很有意思，中國近代史上這麼多的戰爭，一次次地打過來，的確逐步開放，一直到日俄戰爭和新政，此時便徹底開放了。當然，我們不能按照他的這種理解來劃分中國的近代史，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史的確是一部痛史，是一連串捱別人打的歷史，這確實是很悲哀或者說是很悲慘的歷史。但是我們學歷史肯定不是為了痛說家史，也不是為了繼續當憤青——世界已經變了，我們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開端不是像我們這麼劃分的。我們一般把 1840 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但這種劃法今天已經受到了挑戰，許多人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發展脈絡劃分，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至少可以劃到明朝中葉。他們的理由是，畢竟那個時候中國已經和世界發生聯繫了，西方的傳教士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為甚麼我們不能劃到那兒呢？這其實是西方的劃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國家已經崛起了，因此我們所指的西方現代世界的起點肯定不是 1840 年。這一時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英國已經經歷了幾代霸權的嬗遞，這背後的推手是甚麼呢？一是民族國家的興起，也就是我們政治上所說的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制的解體，以及商業革命——商業革命使歐洲商路暢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業制度本身的行會制度也日漸沒落。二是手工業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之前，首先經歷了一場手工業的革命——能夠製造出蒸汽機來，就說明這些國家的手工業工藝已經相當精湛。

舉個例子吧，比如火炮。利用黑火藥的火炮和火槍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到明朝中葉，我們做的槍、炮和火藥都已經趕不上西洋人了。西洋人所掌握的製造槍炮的技術最早都是由中國傳過去的，但我們現在卻都趕不上他們，槍炮的精度不夠，火藥的加工工藝也差得太遠。所以到

明末的時候，徐光啟他們又把西洋的火藥製法和槍炮製法翻譯過來，我們自己再開始仿製、生產，其中主要的類型是紅夷大炮<sup>②</sup>。所謂紅夷大炮，是一種能夠連續發射較長時間的火炮。過去的火炮是從前面裝藥，搗實，然後裝上炮彈，後邊兒再一點火，一打出去。但這麼打出幾炮後，炮膛就會變熱，甚至發紅，這時就不能再往裡填了，否則當場就會炸了。也就是說，得等它涼下來、冷下來再打，而在此期間火炮就不能發射了。而西洋人的紅夷大炮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他們的炮膛是可以打開的，裡面裝一個小炮膛，這樣可以先把火藥裝進去，打完了可以拿出來。由此可見，當時西方人造的火炮已進化到基本具備現代火炮雛形的程度了。而當時的中國火炮鑄造粗糙，炮膛一點兒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還沒把敵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給炸死了。槍的製造工藝更是粗糙。道光帝是精通火槍的，<sup>③</sup>當他第一次見到西洋人進貢的火槍時就非常感慨，覺得西洋人的火槍製造精緻，而中國人不知道何時才能造出同等的產品。

講這個是想說明，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經歷了一場手工業革命，他們的手工業工藝可以造出很精緻的東西，比如為航海造的船，還有為造槍炮、火藥而製作的一些加工機械。工業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來的。以前中國內地教科書裡講，瓦特看著燒水的壺蓋兒被蒸汽頂起來，然後他就發明了蒸汽機。其實現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機最早不是瓦特發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機改進了而已。所以，進行發明並不是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種神奇故事講的，坐在蘋果樹下冥思苦想，突然蘋果“砰”的一下砸腦袋上了，然後他就得出偉大發現了。其實這些發明或發現都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越早的、越是劃時代的發明，它孕育的時間可能就越長，因為那個時候人類還處在蒙昧時代或是蠻荒時代，所以那個時候的發明跟現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樣的。

簡單地做個總結。對比西方，中國在明朝中葉的時候已經落後了。明

朝中後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都來中國騷擾過，而且西班牙人還曾經設想，要不要調軍艦來把中國攻下。只不過後來西班牙人和英國人打起來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人殲滅了，所以這種設想就沒有下文了。如果當時西班牙人決定像征服美洲那樣征服中國，有沒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儘管中國肯定不會像印加帝國那麼容易被征服。我們必須承認，那時的我們已經不是西方國家的對手，我們已經落後了。<sup>④</sup>

## 中國和英國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紀之後，英國稱霸世界的時代開始了，這時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紀末，中國和英國發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中國這個時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最驕傲的皇帝，他自稱“十全老人”，不僅君臨天下，甚至一度想壟斷對經典的解釋權。在中國傳統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即皇帝是政治權威，而思想、理論的權威是孔子，士大夫則扮演著孔子思想的闡釋者這一角色。但乾隆卻剝奪了士大夫的這種權力，他不認為士大夫有資格治國平天下，這種事情應該交由皇帝處理。乾隆自己闡釋經典，然後一幫士大夫拍馬屁，說皇上聖明，皇上說的是最對的。<sup>⑤</sup> 乾隆自己還作詩，自認為文學巨匠。他又打了那麼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覺得很牛，幾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處遊山玩水。當然今天來看，作為個人，他的確很牛，但到了乾隆統治末期，其實國家已經不行了，國庫虧空得很厲害。有這麼一個太驕傲、太奢華的皇帝，國庫就會有危險。所以我們也能夠理解，為甚麼他的繼任者嘉慶馬上變得很節儉，哪裡都不去了，花一分錢都不樂意，道光更是帶頭穿補丁衣服。當皇帝容易嗎？一看國庫

沒錢了，都讓老子花完了，他們也只能節省了。<sup>⑥</sup> 不過，至少在馬戛爾尼來華時，乾隆還是很牛的。

英國派馬戛爾尼勳爵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來華，不是來打仗，而是來跟中國人談判通商的。他們的艦隊來華後停泊在廣州，當時廣州是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員眼裡，那些來中國的外國人中，商人就是來經商的，官員就是來上貢的。當時東南亞的各個國家，暹羅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廣州進入內地上貢的。但現在來的英國卻不是一個傳統的進貢國。在此之前，中國人對英國的確不太清楚，我們只見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但從來沒見過英國人，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雖然在明朝的時候，利瑪竇已經把世界地圖和地球儀帶到了中國，也有一部分中國人知道了這些西方地理學知識，但是到了清朝，中國人對於世界的感知以及觀念又發生了倒退，其開放程度對比明朝大大退步，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圓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國以及周邊的朝貢國之外，還有其他甚麼國家。利瑪竇來的時候已經為中國人畫了一幅《坤輿萬國全圖》，就是地球的平面展開圖，那個時候部分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觀念已經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對於世界的認知卻沒有繼承明朝的遺產，他們在繪製世界地圖時，就胡亂地把當時聽過名字的國家放在中國的腳下，隨便畫幾個海島，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可見當時國人對世界的了解已經發生了嚴重倒退。

清朝這個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來是一個很強大的帝國，因為其版圖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後一個王朝不是清朝，那麼現在中國不會有這麼大的版圖，國土也許會少一半兒。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開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進技術、引進先進設備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強大，因為它遇到的都還是傳統的、處在冷兵器時代的對手——內憂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對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種皈依伊斯蘭教的民族、準噶爾部等不服從清朝統治的蒙古

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較低的。而清軍一方面繼承了明朝的許多火器裝備，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確能戰，又有臣服於清軍的蒙古騎兵相助，所以他們確實很有優勢。其唯一真正強勁的對手是俄羅斯人，但是那個時候的俄羅斯並不夠先進，在當時的歐洲，東歐還是很荒蠻、落後的地方，當時俄國人的火器也不見得比中國人的裝備高到哪裡去，所以中國可以跟它打個平手。但即使如此，當年的雅克薩之戰也並非中國人大獲全勝，因為戰爭後期雅克薩城曾被哥薩克人奪回去。關鍵是，哥薩克人從南歐長途跋涉到遠東，當時還沒有西伯利亞大鐵路，而中國遼東一帶是滿人的龍興之地，地勢平坦，中國人出兵要比他們容易得多，所以打了個平手。除俄羅斯以外，清軍的確沒有一個等量級的對手，所以看起來很強大。同時，因為已經是東亞最強的了，所以清軍也沒有甚麼技術變革的衝動或壓力。當時清軍的精銳部隊有一半兒已經是使用火槍了，清軍還有炮，尤其是仿製或購買的紅夷大炮，這就已經足夠了，許多對手甚麼都沒有。

此前，明朝的對外開放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傳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間，禮儀之爭的問題開始出現並激化。早先來的傳教士都認為，中國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這個禮儀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後來的羅馬教廷卻不這麼認為，他們堅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國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雙方均無法做出妥協。最後的結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時期完全禁教，而羅馬教廷以及西方傳教士的勢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國。<sup>⑦</sup> 傳教士基本撤走了，雖然中國的皈依者還在秘密信教，但東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卻沒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開放。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明朝在中後期雖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員比較喜歡玩忽職守，海禁執行得不徹底，所以當時沿海的商業走私還是很活躍的。但到了清朝這樣一個遊獵民族建立的王朝，他們對於海外貿易是一點興趣也沒有，而且他們認為，只要沾上商業就不是甚麼好事

兒。所以清政府對這種工商業貿易是根本輕視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員真正把海禁給嚴格執行了。多數時候只有廣州一個口岸可以進行貿易。相對於明朝，清朝是一個更加內向的王朝。

綜合這幾個因素後可以發現，清朝在開放問題上存在極大的缺陷。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它靠著內陸的經濟增長也達到了一個傳統社會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國人來了。

英國人當時來華有兩個目的。其一是來炫耀一下他們的工業文明、他們工業革命的成果。所以他們帶了大量的禮物，不僅有中國人特別喜歡的光學儀器（當年利瑪竇就是靠這玩意兒打開了傳教的門路），還有玻璃製品、各種鐘錶以及最先進的槍炮。他們把這些都送給中國人，讓中國人看看英國人有多厲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國人希望中國可以按照西方規矩進行交流和貿易；希望能跟中國平等經商，通過行商來開展貿易；希望中國人能給英國商人提供一些據點，不要總是限制在廣州一個地方。但很顯然，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關於第一個目的，乾隆連禮物的包裝都沒有打開，看都沒看就直接放到圓明園的倉庫裡了，後來英法聯軍還搶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說，英法聯軍從中國搶走的不僅僅是中國貨，還有他們自己造的。據說當時馬戛爾尼曾送給中國幾門速射炮，中國人居然也連看都沒看，呃，中國人還是很牛的啊！<sup>⑧</sup>至於看都沒看的緣故，其實在於後面的原因，英國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關係，這個議題從一開始就障礙重重。

英國人剛從廣州登岸的時候，正好趕上乾隆的八十大壽。這個時候一大幫西洋鬼子來了，還帶來了一大堆禮物。當時的兩廣總督認為這些洋人肯定是來拜壽和進貢的，這是好事啊，於是就上報說有遠夷來為乾隆上貢祝壽。乾隆聽說這麼遠的人來給他祝壽，也很高興，就同意他們來了。於是馬戛爾尼一行就進了內地，他們攜帶的禮物都被插上了貢使的旗幟。馬戛爾尼通過通事翻譯也知道了插旗幟的意思，其實他哪裡

是來祝甚麼壽的，但他裝作不知道，因為若是一開始就把來華的真實目的說破，那麼他們也許就見不到皇帝，啥事也辦不成了。後來一部分禮物走大運河北上，另一部分則走海路，從大沽上岸，再走陸路一直到承德，因為乾隆的壽辰慶典是在承德避暑山莊舉行的。

但在快要見皇帝之前，有個關鍵問題解決不了，就是跪拜的問題。中國人堅持，外夷見皇帝必須下跪。英國人不願意下跪，他們認為自己見本國的君主也只跪一條腿，若是要跪兩條腿，還得磕頭，這絕對是無法接受的。於是雙方之間就起了摩擦，拚命交涉，和珅親自出面都不行。後來馬戛爾尼想了個辦法，讓了一步，稱英國使節到朝中覲見皇帝時可以行三跪九叩禮，但是和珅也得按照英國的禮節向英王行禮——馬戛爾尼隨行帶了英國國王的畫像，要求和珅代表中方大臣向英王的畫像行禮，這樣兩國就扯平了。但在當時的中國，怎麼有人敢給一個夷人的國王下跪呢？誰也不敢，最後就不了了之了。<sup>⑨</sup> 中國人當時的世界觀是天下觀，天下的中心是中國，而中國亦是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應該向中國朝拜，不來也就算了，來了就必須得朝拜。當時沒有外交部，這些事都歸禮部管，這些朝貢禮儀都是國家禮儀，是不可動搖的。所有的外藩在名義上都是中國的臣子，哪裡會有一個朝中大臣，特別是像和珅這樣的人物，會給一個夷國國王的畫像下跪呢？所以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最後只能拉倒。

最後，馬戛爾尼一行還是見了乾隆，乾隆也就沒有要求他們必須雙腿下跪，權當他們是化外之人不明禮儀，唱個大喏就算了，這樣禮儀之爭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有些人，按現在的網絡語言來講，特別喜歡意淫，而且超級會意淫，硬說英國人跪了，還說他們本來不想跪，但後來見到乾隆天威，馬上就撲通一聲雙膝跪倒。話說回來，乾隆沒有迫使英國使者按照中國的禮儀下跪，還接見了他們，並和他們說了話，這似乎很大度，但事實上他是非常不高興的，所以後來英國使者的要求全遭

到了拒絕。乾隆給了他們一些賞賜，其中最珍貴的就是乾隆御筆書寫的“福”字，然後傲慢地告訴他們，我們天朝物產豐盈，不需要和你們通商，你們回去吧。

雖然雙方到最後仍然客客氣氣的，但實際上，馬戛爾尼的這次訪華徹底失敗。不過，馬戛爾尼也收穫了一批副產品——他在內地走了很多地方，當時沒有照相機，但是他隨行帶了很多畫師，他一路觀察過去，做了很多記錄。他甚至還去了許多海防要塞，那些炮台甚麼的，他都看過了。在馬戛爾尼來之前，歐洲還流傳著關於中國的神話。馬可·波羅以後，歐洲關於中國的神話很厲害，東來的傳教士也一直在建構這個神話。歐洲有段時間盛行重農主義，因此關於中國的神話傳得更為厲害，歐洲人一直以為中國很強大、很富足。但馬戛爾尼在中國經過細心觀察後，發現根本不是傳言中的那麼回事兒。中國並不富足，窮人非常多；而且也沒有一種合理的審判制度，官員喜歡貪贓枉法、胡亂斷案，國家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軍備則是一塌糊塗，雖然說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裝備看起來還是有模有樣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擺設，這些炮既不能升降，也不能瞄準，要打的話，只能打一個地方——後來在鴉片戰爭中，英國軍艦也見識到了中國海防炮的這個特色。

馬戛爾尼一行回國後，依據在中國的沿途見聞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筆記、圖畫和資料，這讓西方看到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外強中乾的中國。所以，如果沒有馬戛爾尼使團的這次來華，那麼鴉片戰爭還不會那麼早地發生。當然，後來還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傳教士，以及懷有其他目的的人也來了，進一步把一個真實的中國介紹給西方人。當時中國也沒有甚麼保密的概念，其實中國近代好像一直都沒有這個概念，後來日本人還可以跑到中國的海軍軍事基地隨便照相，以至於現在我們看到的當年北洋水師各軍艦的倩影都是日本人拍照留存的，我們自己則沒留下。總之，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徑，中國的情況逐漸為西方人所了

解。1816年，英國又往中國派了一個阿美士德使團，這次他們沒見到皇帝，甚麼事都沒幹成，但是在此以後流傳出一個關於外國使節不跪拜的段子，並且逐漸發展成兩個神話。

一個神話說，外國人的腿是直的，沒膝蓋，跪不下來。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美國特使華若翰才對這神話進行糾正，說外國人不是不能跪，他們也能跪，但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不向中國皇帝下跪。林則徐禁煙的時候，還信這個事兒——外國人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說，我們睜開眼睛看世界第一人，其實在禁煙之前對外國的情況仍然很糊塗，一味相信只要把外國人打翻在地，他們就站不起來了，因為他們沒膝蓋。當時中國人還傳言，雖然洋人槍炮厲害，但我們可以和他們肉搏，讓他們放馬過來，靠中國武術搞貼身短打就行。中國內地的中學語文課本上有一篇課文叫《馮婉貞》，這個馮婉貞是北京郊區的一個女獵戶，課文說她跟侵略軍進行了一場搏鬥，就是靠近戰、夜戰，使洋人的槍炮不能發揮作用，然後就把侵略軍打敗了。其實這就是一個神話，被後人虛構出來的神話。<sup>⑩</sup>

另一個神話說，洋人以吃牛肉粉為生，如果沒有中國的茶葉或是大黃，那麼他們就會因大便不通而脹死。所以我們只要不給他們茶葉和大黃，那他們就完了，我們就能不戰而勝之。這種神話像林則徐這樣的官員都相信，老百姓就更信了。<sup>⑪</sup>不過，在中西方發生商業往來以後，英國人在一百多年裡，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商品確實就是茶葉。因為英國當時最發達，茶葉在英國從最早的高檔消費品逐漸普及到民眾，最後全民都要喝下午茶，甚至必須喝下午茶。一到下午茶時間，全英國的人都會停止工作去喝茶。而當時茶葉最主要的來源就是中國，英國人來中國主要是買茶葉，銷量非常大。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已經是以千萬磅計，但是通商的地方只有廣州。而且中國人出口的茶葉質量越來越惡劣。開始是把茶葉老老實實地賣給人家，後來茶商開始往收購上來的茶裡摻泥土或沙子，再後來茶農也開始摻，最後搞得英國

人苦不堪言。英國人的茶具中有種器具叫籬，就是因為當時的英國人被中國人逼得沒辦法，不得不用籬來把茶葉中的沙子、泥土篩出去，要不然就沒法喝。此外還有洗茶的程序，得把茶洗一遍。實際上到鴉片戰爭前夕，中英貿易在茶葉問題上已經有了很大的積怨，所以一度有英國人說，甚麼是鴉片戰爭，根本就是茶葉戰爭。當然啦，這個說法是不對的，的確是因鴉片引發的戰爭。

而中國人當時對英國人的商品也的確沒甚麼需求。英國人當時往中國輸入的毛織品、紡織品、玻璃等都沒甚麼銷路。唯一比較好出售的是鐘錶這一類商品，但在當時的中國，這些製成品畢竟屬於只有上層人物才能消費得起的奢侈品。還有鼻煙，這也是專屬上層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這些玩意，貿易怎麼能平衡呢？此時中國出超，英國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國必須拿足額的貨幣來填補貿易缺額，於是英國人常常拿白銀到中國來換茶葉。貿易的不平衡對英國人來說是個大問題，作為一個以商立國的國家，這個問題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而且英國以商立國的理念已經發展到極致，英國人明確表示，他們政府的目的就是促進貿易，保護經商。這與後來戰爭的爆發存在密切的關係。

而在這邊恰恰是一個對商業不在乎的王朝。中國在此時基本不徵收商稅，只對一些商品收過路關稅。而且把對外貿易的活動區域限制在廣州這樣一個非常小的地方，採用我們所講的十三行制度進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這種公行就是一種貿易商行，其實當時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其實在中國沿海四個地方設了貿易口岸，分屬江南省（主要轄今天的江蘇、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廣東省四地，但實際上做起來的主要是寧波和廣州。到了1738年後，寧波這個口岸也逐漸被廢掉，只剩下廣州一個口岸。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朝政府宣佈確立廣州一口貿易政策，同時下令關閉寧波等港口，限令外商僅能在廣州一口貿易。

這種制度是甚麼時候出現的呢？其實在北宋的時候就有這種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對進出口貿易進行管理，但是官員又不想管、懶得管，於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託給中國商人辦理。最後，進出口貿易的具體手續都由商人處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員只負責監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國商人的相關事宜都是由公行來管，商人設置夷館安排外國商人居住，貿易結算以及徵收關稅等事務也都是由商人打點。當時全國只有廣州一口有海關，這個海關隸屬於朝廷的內務府，所以關稅收入屬於皇室的私家收入，而這些收入主要用來購買西方的鐘錶——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鐘錶館裡的藏品大多是從這裡買進來的。但皇家其實也要不了太多這些玩意兒，購買一部分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勵貿易。當時所有的對外貿易只是為了滿足皇室對西方各種奇技淫巧、小玩意的需要，他們就這麼一點追求。但是英國人卻把商業當成了他們立國的命脈。因此，中英貿易從一開始就顯得麻煩，兩邊滿擰。這種情況在今天應該是很難想像的。

在那個時候，主管海關的中國官員沒甚麼需要具體操辦的事務，他們對於進出口貿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時交錢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錢時打了折扣也不要緊，因為官員隨時可以用各種藉口對他們進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窮——會打點上官的、機遇好的就會暴富，有的三兩下子就被弄破產了。他們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規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國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們來管理，其實大部分時間他們也是稀裡糊塗，所以我們常常會看見一些很奇怪的記載，他們制定了很多規矩，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比如說不能把夷婦帶來，也就是說洋人可以來，但不能帶老婆，也不能招娼。因為禁止攜帶夷婦，所以當時廣州一帶已經發展起專門以洋人為客戶的娼妓業，我們當時管這些專做外國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這是禁不了的呀，於是公行商人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官員發現有洋人買春，一般會對洋

人進行懲罰，但這種懲罰也就是裝裝樣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譯，在交通中西時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當與官員打交道時，這些通事常常胡亂翻譯，比如官員會罵洋人“你他媽的混蛋，不像話”，而通事就會告訴洋人這是中國官員在向他問好，在問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說八道。最後懲罰的時候，說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說名義上官府對進出口貿易是在監督，出現問題時也會對當事人進行責罰，但這些舉動都是演戲、裝樣子。這種戲碼一直演到鴉片戰爭前夕。

## 鴉片——打破中英貿易結構的不平衡

早期英國對遠東的貿易是由東印度公司專營的，這是一個商人的聯合組織。這個公司覺得，總是從中國買茶葉，而自己的商品卻在中國打不開銷路，長期下去與中國人做貿易就挺虧，而且由於硬通貨不足，英國商人每每需要從墨西哥或南美等地運來鷹洋、白銀才能跟中國人做生意，這樣做太費事了。英國人希望用一種新的替代物來打破這種貿易結構的不平衡，他們想到了鴉片。

鴉片在緬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東西，當地很多人都用這東西治病、提神，他們吸食鴉片的歷史要比我們長得多。不過鴉片的確有個特點，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癮，於是英國人把這東西輸入中國。一些中國人嘗到了甜頭，就逐漸發展出一整套關於抽食鴉片的文化。我們給鴉片取了很多好聽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甚麼的，還發展出各種吸食的煙具、禮儀等等。這一套套的講究，顯得吸食鴉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後，大家就都來吸啦，這就出事兒了。因為這東西是進口的，很貴，也很傷身體（只是當時的國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原先是英國人的錢往我們這裡流，現在是我們的錢往外流，而且